

论廖仲恺的政治思想

张光宇

廖仲恺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国共产党的挚友。他一生跟随孙中山先生不屈不挠地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拟就廖仲恺的政治思想作一浅论,从而探讨廖仲恺对孙中山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廖仲恺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

一

对三民主义的阐述和发挥,是廖仲恺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有许多独到之处。

(一) 旗帜鲜明的反帝思想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以反清和反帝为主要内容,它的完善经历了从旧民族主义的反清、反军阀到新民族主义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纲领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廖仲恺和孙中山一样,不断地探求着救国的道路。

外患深重、民族危亡的近代中国社会状况,决定了中国民主革命要走救国富强的道路,反帝是首要任务。然而,由于清朝成了“洋人的朝廷”,成了一切矛盾的焦点,所以当时的革命宣传和革命斗争都集中到反清这方面,而极少注意到反帝的任务。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许多革命党人都认为民族主义革命已告成功,廖仲恺也不例外,他在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誓约书”中只讲“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而没有提到民族主义。

由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廖仲恺认识到清政府的垮台和民国的建立并不是民族主义革命已经完成,帝国主义侵略仍是造成中国贫苦落后的原因。“因内的贫民一天多似一天”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使中国“国民劳力的结果,大半分配入外国资本家的腰包里”^①。

国共合作后,廖仲恺对中国革命的一些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他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使中国“沿江、沿海之重要门户,皆为彼所冲破,凡江河、海、铁路所及之处,皆变为其势力繁殖之所在地”^②。帝国主义依靠不平等条约,“用极苛刻的条件,只求有效于他们,而损失于我,使我国的产业,不能自由发展,以竭尽国民的膏血,适足以供他们生产的营养。”^③他还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特点是资本输出,是经济侵略和政治侵略的结合,而且“经济侵略比政治侵略利害得多”^④。他说帝国主义侵略“由不平等条约到经济的侵略,现由经济侵略反响到政治的束缚,……中国自受政治的束缚以后,又复受经济的束缚,国家经济与国民经济,都困苦到了不得,所以士农工商各业,都不能发展”^⑤,结果是中国“实在不堪言产业落后,直可说他无产可落”^⑥。

廖仲恺在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种种事实以后,指出了实现民族主义的途径,即首先是政

治上求解决,然后是经济上求独立。他强调中国问题的解决,“其最重要的,应该从政治上求解决。”^⑦如果“政治上的问题不能解决,则经济上的问题,也无从解决。”^⑧他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中国才有出路,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针对国民党右派把反帝的具体主张篡改得抽象模糊的情况,他提出收回租界等反帝议案,得到孙中山赞成并写进了政纲。他不象当时许多革命党人只是从经济的某一方面着手来讲救国(如实业救国论、教育救国论),而是强调政治上的解决,打倒帝国主义,强调“民族主义实是要救中华民族,使中华民族达到自由独立的国家的地位。”^⑨这表明廖仲恺认识到国家独立是民族革命的首要任务,这是廖仲恺比当时某些革命党人高明之处。

廖仲恺认为民族国家的独立与巩固,必须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倘若长此经济不能独立,怎能够生存呢?”^⑩中国沉重的外债负担就是中国从前受外国欺凌,割地赔款的结果,所以“吾国人民应不承认此债,宁将此款,振兴实业,使吾人得能生活。”^⑪

廖仲恺还分析了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是勾结封建军阀共同进行的,因而明确地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的两个主要对象。“我们既知道中国延长战争,使我们的兄弟不能谋生计,就是军阀。军阀的可以作恶横行,他们背后就靠列强帝国主义者来扶持。军阀是一傀儡,列强帝国主义在后拉线”^⑫,所以“吾人其不欲解决吾人之痛苦及谋国家人民之丰富则已,否则必须与帝国主义战!吾人其不欲打退帝国资本主义则已,否则必先与国内军阀战!吾人其不欲打倒国内军阀则已,否则必先唤起全国国民,共图国内革命!”^⑬这里,廖仲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思想是相当明确的,基本上阐明了中国革命的途径,即唤起全国国民,用国民革命打倒军阀,并最终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统治。

廖仲恺由于认识到“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运动,对内要打倒官僚军阀及一切反动力量,对外要抵抗帝国主义者的重重压迫。”^⑭任务非常艰巨,必须联合一切国际革命力量才能成功,因此他坚决贯彻“联俄”政策。他说列宁“是打破帝国主义的实行家”^⑮，“他所做的事都是为被压迫民族奋斗,为无产阶级而奋斗。”^⑯廖仲恺和苏俄顾问鲍罗廷等的关系都很密切。

廖仲恺的民族主义的特色突出地表现在他旗帜鲜明的反帝思想。他从旧民族主义着力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恶,到新民族主义接受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坚决地站在反帝斗争的最前列,正如周恩来在悼念廖仲恺的《勿忘党仇》一文中所赞扬的:“最近几次反帝国主义运动,廖先生更是唯一的急先锋。”廖仲恺反帝的坚决态度和革命实践,确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家中少有的。

(二) 直接民权的主张

民权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核心,“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曾激起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并为捍卫民国进行艰辛的斗争。廖仲恺在宣传和捍卫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过程中着重宣传了“直接民权”的主张。

民权主义是使中国革命的思想具有近代性质的标志。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廖仲恺认识到在中国这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统治历史的国度里进行国民革命,民权主义是十分重要的。早在1914年,廖仲恺在参加中华革命党誓约书中就提出“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⑰,表明了他捍卫民主共和国的决心。这一时期,廖仲恺协助孙中山进行了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护国斗争和要求恢复临时约法的护法斗争。1919年前后,廖仲恺译著了《三大民权》、《革命继续的工夫》、《全民政治论》等一系列文章,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和民主政体等思想。

廖仲恺分析了英美等国的政体情况，批判了代议制。“美国虽为民主，与英国国体又不同，然而代议制度……代表议院之不足为民意之反射，与夫民权之埋没于政党之污垢，较英国尤甚。”^⑭代议制度实质上是“少数政客利用政党的力量，假托平民政治的招牌，来行富人政治特权之实”^⑮。

廖仲恺认为，“我们中国既然叫做中华民国，主权的主体，当然就是人民。”^⑯我们必须行直接民权，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他指出直接民权包括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创制权是人民“决定一种政事之兴废，或强迫国会通告法案之权”；复决权是“投票决定立法机关所通过某种法案之权”；罢官权是“决定所选举官吏应否罢免之权。”^⑰廖仲恺认为实行直接民权就能消除中国政体（民主）与国体（代议）之间的矛盾。国民有了这三种民权，就可以打倒拥兵的军人，罢免卖国的盗贼，就能澄清政治。“国民有了这三种民权，民国的主权才算是回复到原本国民的身上，中国政治的毛病，虽不敢说是完全救治好，也就差不多要好八九分了。”^⑱

国共合作后，廖仲恺对民权主义的实现倾注了更大的热情。他论述了在近代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共和国才是中国出路所在，“因为做成一个民主国，然后可以把国家主权放在四万万同胞手上，然后可以使四万万同胞都有管理国家的义务，国家才可以发达，人民才可以安宁。”^⑲

廖仲恺要求建立的“民主国”，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在西方已成为反动的东西，但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仍不失为先进的理想。廖仲恺主张直接民权，把主权落实到四万万人民的每个人手上，自然比孙中山晚年强调“权能分开说”，主张把国家的“治权”放在少数“专门家”手上的思想前进了一步。

（三）发展实业的社会主义倾向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最具特色的思想，廖仲恺对之也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并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发展实业的社会主义倾向。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求打倒封建主义，推翻帝国主义，它的最终目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富强的民主国家。但是，长期的革命斗争往往使人们把革命本身作为目的，而忽视了建设这个最终目标，只有孙中山、廖仲恺等少数资产阶级革命家对建设富强的中国这个革命最终目标保持较清醒的认识。廖仲恺说：“革命作用，一面是除旧，一面是布新……一个国家也是这样，革命就是它求活的路子。再进一步说：就是要一面革命，一面建设。”^⑳

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廖仲恺对中国产业的状况和振兴实业的道路都作了探讨，他分析了中国生产的萎靡是由于“交通之不便，资本之缺乏”，发展实业必须改良交通，积累资本。他认为由于交通不便，致使地力未能开发，富源未能开通，因此生产发展的第一要素是改良交通。交通改良后，“从前闷死了的无穷的物产，要它活泼的输出；从前压死了的民生商业，要它热腾腾的发达。”^㉑他还认为发展实业的资金应“集物产之赢余”来积累，具体方法是把“全国赢余的物产，以纸币的形式，转化为资本，用来修筑铁路，开拓运河。“为生产之消费，则贫乏无自生，先能免贫，即可由渐以致富”^㉒。在列强环视、政局腐败的中国，廖仲恺企图通过改良交通，积累资本来发展生产，建设富强的中国虽是不通的，但它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意愿，和孙中山发展实业、振兴中华的思想是一致的。廖仲恺“集赢余之物产”的资本积累途径比孙中山集外资发展实业的主张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廖仲恺参与了中国人民首次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讨。他在1905年翻译了《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文章，接受了当时开始在日本流行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个理论探讨过程中，他对资本主义的弊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的译作就是以“屠富”的笔

名在《民报》上发表,表明他对资产阶级(豪富)的痛恨。国共合作后,他通过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比较,进一步加强了他的社会主义倾向。

廖仲恺认为资本主义是发展资本家的“私人经济”,“生产所赢余之利益,自然都趋归这一阶级手上”,“生产越多,贫民越多”,因而“社会之偏枯,阶级之争斗,到底是免不了的。政治组织之经济的基础那就是从根本上摇动起来,非至崩坏不止。”而社会主义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因为社会主义是“造福社会全体的”,“生产之利,不归一人,而归社会”,“人人有平等之机会,社会无偏枯之病。”^{②7}。因此,“社会主义”是“中国将来之光”,中国要有所建树,“除非是建一社会主义的国家。”^{②8}廖仲恺的社会主义(他称为“共产的社会主义”)是不同于孙中山的“集产的社会主义”,在更大程度上,它同于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廖仲恺就倾慕苏俄社会主义,他说“俄国革命以后,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事,掌诸国家机关与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②9}。因此,他自然不会同意“轻则浪费,甚则腐败,名则以利社会,实则有饱私囊”^{③0}的“集产的社会主义”。廖仲恺在某种程度上从物质资料生产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探讨了阶级斗争的根源和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承认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种观点具有唯物史观的因素,是孙中山所没有详细论述的。

“土地”问题是与“资本”问题紧密相联的,它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课题。廖仲恺始终关注着“土地”问题的解决,他在“土地”问题上的观点就是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即定地价、照价征税、土地国有。1905年廖仲恺翻译了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乏》一文,他极为推崇书中的观点,认为“土地若许为私人所有,势必举劳动阶级而奴隶之”,使“生产之势力以衰”,因此“盖救贫乏于无穷,而防庸之倾于不能藉为生活之者也,莫有以土地归公若也!”^{③1}但是,土地归公,并非“横行强占之谓,而亦不忧骚扰,只须行以最简单便易之法,除土地真价外,凡税俱捐免之”^{③2},土地价值“准由民间自由呈报,惟声明如将来政府或收用此土地,照所报数目给价,可以不虞有少报之弊”^{③3}。国共合作后,廖仲恺对“土地”问题的解决表示了更大的热情,他说民生主义“对于土地问题,是有个解决方法的,这就是我们‘平均地权’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先要拿土地政策来做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一个手段”^{③4},就是要把土地收归国有,经过测量报价之后,实行土地增价税,国家“拿这宗款项做扩大教育、交通改良、社会改良等费”,这样做之后,“土地的权利就是国民大家平均了”^{③5}。廖仲恺的“平均地权”主张,反映了农民的土地要求,触及到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主题,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他是用亨利·乔治的单一税来达到土地国有,平均地权,注意的是“有重大价值”的城市土地问题,而非广大的农村土地问题;忧虑和企图消灭的是中国未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绝对地租量的增长,而非占当时统治地位的封建地租;采取的手段是地价自报、照价收买的改良方法。这一切说明廖仲恺的“平均地权”思想和孙中山一样,带有民粹派的主观社会主义色彩。列宁说:“民粹主义为了‘反对’农业中‘资本主义’,竟然实行能够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发展的土地纲领”^{③6}。

但是,实践比理论更为重要。国共合作后,廖仲恺坚决执行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支持农民运动,支持农民减租减息的斗争和土地要求,成为农民阶级的朋友。

二

廖仲恺不仅对三民主义有所发挥,而且在群众观点和阶级斗争观点方面也有显明的特色。

有无进步的群众观点是区别唯物史观和英雄史观的一个重要标志。廖仲恺在革命过程中较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唯物史观因素。五四运动中，“人民才觉醒起来，……，北京根深蒂固的几个大官也就罢免了，政府对于欧洲和会的条约也不敢签”^②的事实，使廖仲恺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国共合作形成后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的影响下，廖仲恺在群众观点和阶级斗争观点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

廖仲恺分析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他认为太古时代是没有阶级划分，只是后来生产的发展，“因地位职业及经济的条件，这一群人和那一群人不同，社会就分成几个阶级。其中一个阶级，拿他所占得的便宜，不绝的欺骗，掠夺别个阶级劳动的成果。……被欺骗的阶级，便渐渐地不服，常要奋起来抵抗他们，这就是阶级斗争的起点，也就是社会经济问题的起点”^③。他从物质生产的历史，考察阶级和阶级斗争起源，承认阶级斗争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比孙中山高出一着。因为孙中山往往有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认为中国只有“大贫小贫”的区别，没有阶级的划分。

廖仲恺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依靠以农民为多数的国民。廖仲恺在划分社会阶层时，有时沿用孙中山的“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的三阶层划分法，但他认为先知先觉的圣人和不知不觉之人都是国家所不足恃的，“故国家所依靠的，乃依着第二流后知后觉之徒”，这“后知后觉之徒”就是绝大多数的国民。廖仲恺非常重视农民的作用，他说：“国民革命之重要分子为国民，国民中最多莫如农民，国民革命之唯一要件须得农民大多数了解与集中本党旗帜之下，如农民不了解与不集中本党之下，则革命断无成功之可言。”^④他对中国民主革命实质的认识，达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度。孙中山晚年制定了扶助农工政策，但他对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是认识不足的，因此，他强调“权能区分论”，认为人民是“不知不觉”的，“必须把国家大事付托给有本领的人”。“权能区分论”曾带来严重的后果，成为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一种借口。

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的每次失败，使廖仲恺认识到议会斗争、军事冒险都不能成就革命，“惟有工农兵的大联合，始可达到成功”^⑤。他说：“要想实现我们的理想，不得不用一种力量——强力——使它实现。以力量——强力——来实现理想就叫做革命。以理想来结合群众——工农商学阶级——使他们自觉去武装起来扫清障碍，这就叫做国民革命。”^⑥廖仲恺主张暴力革命和群众运动来实现革命的理想，表明他对革命的道路和革命的力量有了正确认识。他那“以主义为主干的军队”和“群众——工农商学阶级”的结合来成就革命的主张，表明他基本上找准了革命的依靠对象。所以，刘少奇评价廖仲恺“确实了解中国国民革命的进程及工农群众所占之位置”^⑦。正是由于廖仲恺这种进步的群众观点，使他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坚决支持工农运动。

三

廖仲恺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是他一生“顺乎世界之潮流，适乎人群之需要”的结果，是他一生不断追求真理，探求救国道路的产物。

外患日深、民族危机日重的近代中国，使廖仲恺很早就有救国图存的思想。廖仲恺于1877年生于美国一个不大富有的华侨家庭，1893年回国，这时期正是清朝腐败日甚、资本主义侵略加深时期，因此他非常痛恨资本主义对华侵略。也由于他成长于美国，更直接、更多地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与国内封建势力联系较少，也不象孙中山那样在接受西方文化

前曾受封建文化的熏陶,因此他反对封建势力、支持农民要求的态度是坚决的。周恩来说廖仲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没有买办性”^④。

1902年,廖仲恺留学日本,不久,他结识了孙中山,开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05年他参加同盟会后,更成为孙中山的重要助手,为革命工作四处奔忙。辛亥革命后的惨淡形势,没有动摇他继续寻找救国真理的信念,为了捍卫共和国和“临时约法”,他协助孙中山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在这一时期,廖仲恺遇到了世界和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他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芒和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新兴的、朝气蓬勃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动工农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又使他看到了革命胜利的前景。通过与共产党人的接触,廖仲恺的思想发生了显著的进步,特别是1922年9月与1923年2月,他两次受孙中山委托,与苏俄代表越飞在日本商讨联俄、联共问题,因而对苏俄社会主义的政策,对苏俄革命和建设,对共产党的方针有了较详尽的正确认识,从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坚决拥护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在国共合作中,廖仲恺与中国共产党人真诚合作。他与在广东和到过广东的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湃、苏兆征、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邓中夏、聂荣臻、萧楚女、恽代英等坦诚相待,亲密合作。在合作过程中,他受到共产党人思想的深刻影响。

注释:

① 《国民的努力》,《双清文集》上卷,第345—349页。

②③③ 《农民运动所当注意之要点》,同上书,第702、703、698页。

③⑥⑦⑧⑩ 《中国实业的现状 & 产业落后的原因》,同上书,第712、719、718、719、719页。

④⑨ 《帝国主义侵略史谈》,同上书,第840、837页。

⑤ 《在省港罢工委员会招待各界会上的演说》,同上书,第970页。

⑪ 《在黄埔军校的政治演说》,同上书,第736页。

⑫⑫ 《在石井兵工厂青年工人学校的演说》,同上书,第628、626—627页。

⑭ 《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同上书,第757页。

⑮⑮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追悼列宁大会上的演说》,同上书,第609、601页。

⑰ 《参加中华革命党誓约书》,同上书,第70页。

⑱⑲ 《〈全民政治论〉译序》,同上书,第141、125页。

⑲ 《立法院之两院制国民全体议决制及财政监督》,同上书,第336页。

⑳㉑㉒ 《三大民权》,同上书,第128、130、129页。

㉔ 《革命继续的功夫》,同上书,第322页。

㉕ 《中国人民和领土在新国家建设之关系》,同上书,第277页。

㉖ 《钱币革命与建设》,同上书,第314页。

㉗㉘ 《〈各派社会主义与中国〉序》,同上书,第740—741页。

㉙㉙ 《消费合作社概论》,同上书,第931、929页。

㉚㉚ 《进步与贫乏》,同上书,第4页。

㉛ 《在广东议会地地税换契案的说明》,同上书,第64页。

㉜㉜㉜ 《孙中山平均地权注释》,同上书,第923、926、923—924页。

㉝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8页。

㉞ 《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双清文集》上卷,第905页。

㉟ 《对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的演说》,《双清文集》上卷,第749页。

㊱ 《廖仲恺先生与工农政策》,《刘少奇选集》上卷,第5页。

㊲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7页。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